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三十九)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崩盘。危机从金融财政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主要西方国家无一幸免，失业率达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超过3千万人，主要工业国除苏联外，工业生产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罗斯福就职的一百天内，围绕着“解困、复苏、改革”的主题，接连出台了很多项法案，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至今仍发挥着影响。

罗斯福颁发的总统令数量超过他之后20世纪所有总统颁发的总统令数量的总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国的失业率都没有降到两位数以下。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走上了高税收、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苏萨 (Dinesh D' Souza) 在新作《大谎》中指出：“《国家复苏法》

(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 是罗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这个法案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 [17]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以充分的史料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与愿违的：新政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社会保障法使失业率增高；高税收破坏了健康的企业经营模式；劳工法造成失业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称赞这本著作说：

“鲍威尔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新政影响了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延长并加重了失业，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贵的政府准备了条件。” [18]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在极短时间内，约翰逊就发布了一系列总统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扩大福利计划，提高税收，急剧扩大了政府的职权。有趣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新纲领》（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几乎如出一辙。美共书记霍尔（Gus Hall）如此解释这个纲领：“共产党对‘伟大社会’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老话概括——‘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梦想’。我们共产党人支持‘伟大社会’的每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的梦想是社会主义。”霍尔所谓“同一张床”指的是“伟大社会”政策。[19]虽然同样支持“伟大社会”的举措，约翰逊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为了把美国一步步引入社会主义。

“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这两项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对福利的依赖、越来越多青壮年拒绝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由于福利政策照顾单亲家庭，实际后果是鼓励了离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据统计，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儿中为3.8%，这个数字到1965年时是7.7%。“伟大社会”改革之后的25年（1990年），这个数字骤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如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犯罪率飙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几代人无法摆脱贫困、不劳而获的思想变得根深蒂固从而形成自愿失业大军等等。

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

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 [2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民众形成对福利的依赖之后，政府要想减少福利数量和种类，可以说比登天还难。“福利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的痼疾，使众多政治家和学者一筹莫展。

上世纪70年代之后，极左派放弃了令美国民众警惕的革命话语，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读者对后者一定不陌生，“进步”一直被共产党当作“共产主义”的隐语使用，比如“进步运动”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进步知识分子”指的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地下党员。“自由主义”也好，“进步主义”也罢，其实质并无不同，其内涵都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传统、“社会公正”、政治正确、高扬女权、同性恋和性变态者的权利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已。

我们无意指责哪一个政要或者个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局中，要想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确很难。在一页页历史翻开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初以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下手，东方发生暴力革命的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和全社会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逐渐左转。就美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政府采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策。“福利国家”培养了人民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与此同时，无神论、唯物论迅速侵蚀美国社会的道德肌体，远离了神、远离传统道德的民众，在花样百出的共产主义骗术面前，渐渐失去了抵御能力。

.....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史的分水岭。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运动从东方到西方席卷全球。与中共主导发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国的反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一个多中心或者说无中心的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间，参加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于不同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诉求。其中有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有人争取有色人种的民权，有人反对父权、争取女权，有人争取同性恋者权利。其间混杂着反对传统文化、反对权威，追求个性解放和享乐主义，推动使用毒品、摇滚乐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毁掉正统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传统文化。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全球文化现象，基本上来源于共产主义。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所谓“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1923年，该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经考虑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名字，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为中性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有一句“名言”：“谁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

(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 马尔库塞对这一句话做了如下发挥：“西方针对每一个它所接触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美国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恋的集合地。美国社会是压迫人的、邪恶的，不值得为其效忠。”显而易见，法兰克福学派以西方的传统文化为其主要敌人，意欲通过毁灭文化最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

1935年法兰克福学派迁到美国，挂靠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下。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本土的左派知识分子一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变体，腐蚀了其后几代美国青少年。

马尔库塞的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思想，主张解放文明对性的压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马尔库塞认为，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能的过度压抑，为此，必须反对一切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权威，把社会变成一个可以无度享乐且不需工作的乌托邦。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品《爱欲与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庞大著作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这本书里，马尔库塞完成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结合，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变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这本书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与青年读者之间的桥梁，把反抗哲学直接转化为上世纪60年代的反抗运动。[22]

马尔库塞说：“（反文化运动）可以称之为—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针对的是整个文化体制，包括现存社会的道德……有一点确凿无疑：传统的革命观念和革命策略已经终结。这些概念太过老套……我们必须用分散的方式使这个体系分崩离析。” [23]

能够读懂法兰克福学派晦涩艰深理论的造反青年寥寥无几，但马尔库塞的思想主旨却简单明了：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性、毒品、摇滚乐应有尽有，“要做爱，不要战争”。只要对一切权威和规范说“不”，就算参加了“高尚的革命事业”，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革命多么廉价和简便易行！难怪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很多造反青年出于自发，但最激进、处于运动最前列的很多学生领袖是受国际共产主义培训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训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学生领袖；学生抗议活动是共产主义团体直接组织推动的结果。从“争取社会民主学生组织”分化出去的极左翼团体“气象员”

（Weathermen）1969年发表的声明宣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的话。[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反文化运动对西方社会文化的颠覆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第一，它使很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变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摇滚乐迅速侵蚀青少年的道德观，把他们培养成反神、反传统、反社会的潜在腐蚀力量。第二，创造了街头革命的先例，培养了广泛的反社会、反美国的思维方式，为后来的街头革命开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轻人街头革命受挫之后，进入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硕士学业，然后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教育界、媒体、政界、工商界，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带到体制内，发动了一场席卷美国社会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主要的媒体、高校、好莱坞大多成为左派的大本营。里根总统在位时，在政界稍微扭转了向左转的势头，但90年代以后，政策再度左转，到近年达于顶峰。